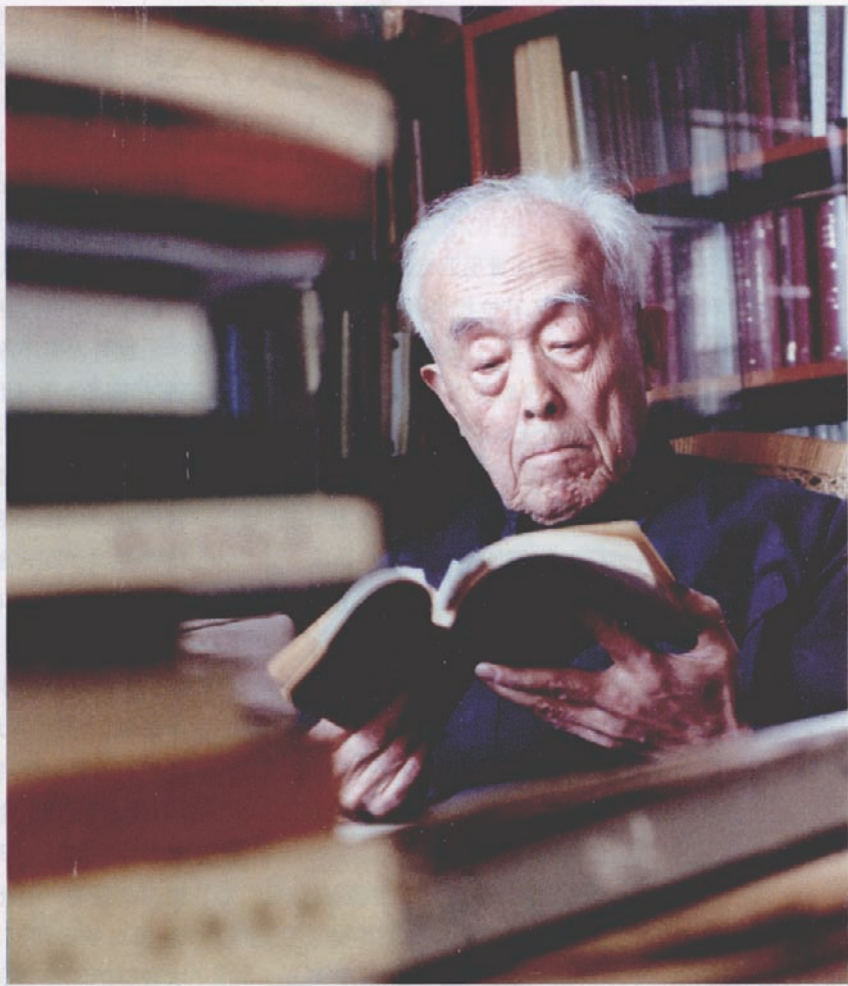


学者都是喜欢书，爱护书的。在我接触的老一辈学者当中，大概季羨林先生是我所见到的一位最爱书的人了。

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，因为参加季先生在北京大学主持的“西域研究读书班”，开始有机会到季先生家里去问学。以后因为先后帮助季先生编辑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》、《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》、《敦煌吐鲁番研究》等书刊，所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季先生在朗润园十三公寓的住所去请益。特别是在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，季先生在考释吐火罗语《弥勒会见记剧本》时，我帮他查找一些有关的资料，借阅北大、北图的一些外文书刊，所以有更多的机会登堂入室，在季先生的书房里海阔天空地聊天。

季先生在未名湖后湖畔的十三公寓东面单元的一层有两套房子，西面的一套主要是起居、会客的地方，东面的一套是书房，聊天的地点主要是在东面。

从东面门进去是个窄窄的过道，放了几个书架，上面是些不常用的书。里面有三个书房，大小居中的一间四壁放的主要是佛学方面的书，包括一套原版的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，中间一个方桌，看这些大书时可以放在上面阅读。最大的一间四周都是书架，上面的书内容很广，包括有关西域、印度等方面的书，比如有一套绿色封面精装的《德国梵文学家文集丛书》，就放在一入门的书架上，整齐又有震撼力。房间中部有个大桌子，周围是沙发和凳子，靠窗户处还有一个躺椅，我们就坐在桌子的四周聊天。里面是一间小房间，主要用于季先生写作，放的是一些他写作时要在手边用的



季羨林先生与书

■ 荣新江

书。后来房间不够用，又把封闭的阳台当做一间书房，季先生早上起得很早，阳光很好，又不热，所以这里成为他写作的又一个美好天地。

看着书架上这么多好书，有些是图书馆里也借不到的专业书，我很想借回去阅读，但不敢开口，因为我听说季先生一般是不借给人书的。我轻易不敢问季先生为什么不借书给人。

有一次，季先生问我认识不认识

历史系一位搞佛教考古的老先生，我说认识。季先生又问我去没去过他家里，我说去过。季先生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去他家的时候，帮我看看有一本《大正藏》第19卷放在什么地方，回来告诉我在客厅还是书房的哪个书架的第几层。”他解释说因为这一本《大正藏》是那位老先生从他这里借去不还的，所以他的整套《大正藏》成了残书，而且这本《密教图像部》经常要用。

他说等我侦察清楚在什么地方，他就找个机会冲进他家，拿起那本《大正藏》就跑，完璧归赵。我听着这像小孩子般淘气的话，看着的却是季先生非常认真的表情，我感到了他对书的那种挚爱。我虽然不敢遵照他的指令去那位老先生家里侦察，但我明白季先生为什么不借书给人了。季先生是一位学者，他对书的热爱是和做学问紧密联系在一起，没有了书，影响了他的治学，他那焦急的心情可想而知。

后来，他的日本学生辛嶋静志在日本东京神保町的旧书店里买到了这卷《大正藏》的零本，作为“束脩”奉献给老师，使季先生的《大正藏》终于成为“完璧”。后来，那位老先生也作古，季先生就再也没有提起这事了。

说季先生不借书给人，也不是绝对的，一些其他地方都没有的书，我也只好鼓足勇气向季先生开口，而每当这时，季先生都会非常痛快地把书借给我。回想起来，这样的借书前后共有三次。

一次是在1991~1992年，那时我和邓文宽先生在一起整理敦煌市博物馆藏本《六祖坛经》，在季先生家看到韩国金知见寄赠给他的所编《六祖坛经的世界》（汉城：民族社，1989年）一书，其中不仅有金知见的《校注敦煌六祖坛经》一文，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杨曾文先生的《敦博本〈坛经〉的学术价值》一文，文中附有敦博本《坛经》首尾照片，是敦博本原貌的首次公之于众，所以，这本书是非看不可的。我只好向季先生开口，并得到他的慨允，把书借了出来，还把有关的两篇文章做了复制。我和复印的人商量，由我自己来印，不能压得太重，免得损坏了图书。

另一次大概也是在借《六祖坛经的世界》的前后，这次借书似乎有点底气，因为我向他借的是Werner Thomas的Tochansche Maitreya-Parallelenaus Hami (Sitzungsberichte der Wissenschaftlichen Gesellschaft an der Johann Wolfgang Goethe-Universität Frankfurt, XXVII, 1. Stuttgart 1990) 和Zwei Weitey Maitreya-Fragmente in Tocharisch A. Stuttgart 1991。这是我1991年上半年在英国时，从德国订购并让Otto Harrasowitz书店直接寄给季先生的，因为我知道那时他正在研究吐火罗语《弥勒会见记剧本》，所以买了送给他。借出来这两本小册子一看，原来作者是根据季先生已经发表的焉耆出土残卷来和季先生商榷的，但愿我从那么老远寄给他的书没有让他不高兴。

还有一次是他的《新疆博物馆藏甲种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残卷》的英文本 (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-Nat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, China. Transliterated,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i Xianlin, in 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 and Georges-Jean Pinault, Berlin and New York: Moutonde Gruyter, 1998) 出版后，我在翌年的北京国际书展上看到，但只能翻翻，无法细读。后来季先生收到了样书，正好汤一介先生让我给《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》写一篇文章，我就想写季先生关于吐火罗语《弥勒会见记剧本》的研究，但手边无书，只好去向季先生借他那里的英文原版，季先生当时只收到一本，马上借给我了。我随后撰写了《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典范——〈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〉读后》（载乐黛云编《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·纪念

季羡林教授九十寿辰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1，42-46页），但书并没有马上归还，因为我心里还寄希望于季先生会不会再得到几本样书，发慈悲心让我留下这本。但德国的出版社没有这么大方，季先生也只得这么一本，所以不久后我只好爱而释手。

季先生一般来说不外借书，但他却大方地送给人自己的著作。粗粗看看书架上的藏书，其中季先生陆续送给我的书就有：《印度古代语言论集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）、《罗摩衍那》（8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）、《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》（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）、《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》（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）、《季羡林序跋集》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）、《留德十年》（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）、《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》（台北东初出版社1995年版）、《季羡林文集》（24卷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-1996年版）、《文化交流的轨迹——中华蔗糖史》（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）。他给我的书，都只写“赠新江”三个字，前后十多年没有任何变化。季先生出版的书很多，有学术著作，也有散文，还有他人编辑的各种书籍，现在回过头来看他送给我的书，除了《留德十年》一种之外，都是纯学术著作。我知道季先生送给我这么多书，目的是鼓励我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，今天看着这些书，就像看到季先生一样，因为书中的许多内容，他都给我讲述过，有的还不止一遍。

季先生走了，他的书还在……（摘自2010年第2期《中国文化》）□